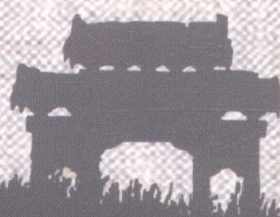


走进
《白鹿原》

ZOUJIN
《BAILUYUAN》

黄立华◎著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走进

《白鹿

鹿

ZOUJIN
《BAILUYUAN》

黄立华◎著

原》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走进《白鹿原》/黄立华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 5
ISBN 978-7-5396-7678-4

I. ①走… II. ①黄… III. ①《白鹿原》—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04193 号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AHSKHQ2019D008)

出 版 人: 姚 巍
责任编辑: 柯 谐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引论 / 001

第一章 / 012

第二章 / 019

第三章 / 025

第四章 / 029

第五章 / 033

第六章 / 036

第七章 / 047

第八章 / 053

第九章 / 058

第十章 / 061

第十一章 / 067

第十二章 / 072

第十三章 / 075

第十四章 / 081

第十五章 / 086

第十六章 / 090

第十七章 / 095

第十八章 / 101

第十九章 / 111

第二十章 / 115

第二十一章 / 120

第二十二章 / 122

第二十三章 / 124

第二十四章 / 132

第二十五章 / 137

第二十六章 / 148

第二十七章 / 153

第二十八章 / 157

第二十九章 / 165

第三十章 / 169

第三十一章 / 176

第三十二章 / 182

第三十三章 / 188

第三十四章 / 193

后记 / 201

引 论

陈忠实的《白鹿原》自问世以来,迄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从问世到现在,它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一直长盛不衰,始终是读者心中最受欢迎的当代长篇小说之一。关于它的评论和研究也一直非常活跃,围绕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论者们展开了热烈和丰富的讨论,也产生了诸多激烈的争议。陈忠实先生已经离世,但他的《白鹿原》注定会传世。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的长篇小说杰作,它为中国当代文学宝库提供了白嘉轩、朱先生、鹿三、黑娃、白灵、白孝文、田小娥等诸多性格鲜明而又生动的人物,同时提供了不同于小说篇名《白鹿原》的“白鹿原”的文化符号。今天我们怀念陈忠实,首先要做的就是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发掘其中的思想性和艺术内涵,总结他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有益的营养和借鉴。

—

雷达先生在《废墟上的精灵——〈白鹿原〉论》里写道:“《白鹿原》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1]我们在读过《白鹿原》以后,首先感觉到的是,它具有十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容量,这使得它足以构成整体、自足和饱满的世界;其次也能感觉到它在历史的动荡和文化的撞击中既展示出社会群体的现实状况和生活愿景,又探究不同层次的不同个体的独特心理和行为选择,从而达到了“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深度。

在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宗族社会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单元,它上接民族国家,下连家庭个人,既有服从国家整体意志的一面,又有自身特殊的传统和约束,从而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沟通上下、结构全局的关键环节,中国文化的众多基本特征和中国民族灵魂的众多特质与之都有密切的关联。在以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尽管宗族社会也曾被注意和描写,但并未被作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单元列为考察社会演变和发展的因素,在涉及社会变革的文本中,人们更多的是从阶级和政治集团的角度去塑造人物形象。这一点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话语所决定的,它主要是一种旨在倡导新的革命的输入性话语,并非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实际。民国以后,作为传统因素的宗法制度和秩序日渐受到新兴权力机制的冲击和挤压,同时也是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加以否定的对象,但它并不是革命的主要对立物,也不是推进革命的主要参照系,因此它处于一种表面上被否定而实际上被忽略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它在现当代文学话语中被同样忽略的情形。

《白鹿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灵魂世界,它围绕着宗族社会这个最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机体在近现代历史面临动荡和转轨而出现的挑战和衰微来展示传统文化的走向和命运,同时探讨不同的人在此环境下所呈现的坚守、沉沦、挣扎和自新。作品显示了阔大的历史背景和本真的人物生存状态。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创作《白鹿原》的年代,正值国内“文化热”的兴起,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剧烈的对内对外政治斗争之后,人们得以冷静下来思考整个民族的过往和未来,强烈感受到文化传统在国人生活中的极其重要的存在与作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几十年在乡村与底层民众的朝夕相处,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80年代的分田到户等一系列乡村的变化,对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因素了然于心,他的脑子里已不再只是当下的各色人等,而是从这些人身上想到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更早的祖先,想到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所曾经历的一切,他们身上有哪些基因仍然存活在今天的后代身上,又有哪些也许不该消失的东西已经默默消失。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白鹿原》的一个重要

时间性经验,就是恢复乡土中国‘宗族’概念的社会记忆,以儒学与宗族文化的结合,表现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主体地位’。”^[2]

小说以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为背景,以关中白鹿原这片地域为主要场所,着重描写了一个由白、鹿两姓构成的宗族群体的命运变迁,其中重点呈现了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鹿三、冷先生、仙草和白孝文、鹿兆鹏、白灵、黑娃、田小娥等两代人的形象和性格,其中朱先生、冷先生和田小娥虽非白、鹿两姓,却与白、鹿两姓有着各种亲缘上的关系,实际上也与这个宗族群体关系密切。这个宗族社会有着中国传统宗族社会所具有的一系列重要特征,包括族长的确立与承袭、以族长为代表的宗族对其成员的自治性管理和约束,通过宗族祠堂树立对宗族的依顺和礼敬,合全族之力应对各种天灾人祸,保持本宗族所固有的某些民情风俗,等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乡村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存在着的,这种建立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模式在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中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宗族之间已经逸出‘家国同构’的传统框架”^[3],因此,这种挑战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应对挑战或说反挑战同样有其必然性。谈论这种挑战或反挑战的孰是孰非,严格来说并不是文学家的主要任务,而是历史家和理论家的事情。文学家当然也要有历史是非,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写出这种博弈中的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让读者读到对历史的认识和对人生的启示。小说《白鹿原》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中的朱先生、白嘉轩、鹿三、仙草、白孝武是属于维护传统宗法体制的阵营,而鹿子霖则显示出对此的游离,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白孝文以及黑娃则表现了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反叛。正是这些维护、游离和反叛,形成了小说中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人物内在性格和命运的多彩独特。

朱先生作为宗族特别是白嘉轩的精神领袖,是宗法文化的理论化身。正是在白嘉轩处于因城里“反正”而出现困惑的时候,朱先生拿出了他所制定的《乡约》文本,指点着白嘉轩今后的方向。他还帮助白嘉轩完善了以造

塔镇住田小娥阴魂的构想。尽管朱先生并不显得顽固和迂腐,不少时候还体现出为人处世上的灵活与人性化,但他在总体上显然是认同并且维护宗法社会的伦理与秩序的,他有诸多让人传扬的言论举止,其实也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的立场的。对他来说,近现代社会出现的革命是模糊的,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反对,但他留下的困惑和担忧自有其应有的分量。

白嘉轩是朱先生文化理想的实际践行者,他以他一生的顽强和坚韧来守护着宗族社会的理想与原则。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写出了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为什么有如此担当和付出,一方面他生长在宗法社会的时代,正是这种社会理想和原则哺育成长的产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自身与这种制度之间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他出生在具有族长继承权的白姓长门之家,这是宗族世袭制度给他天生的特权。在父亲老族长死后,他顺利继任族长。由于连娶的六房女人相继死去造成的家道中落和无子嗣,他在族长的位置上坐得并不踏实。尽管他通过种植鸦片富了家业、娶了第七房女人仙草并生了几个儿子改变了这种局面,其中却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细节,就是他利用计谋换得鹿子霖的风水宝地,得到了象征宗族祥瑞的白鹿的滋润,其中既体现了白嘉轩的“人为”,也让他觉得是“天意”。自觉有了“天意”眷顾的白嘉轩此后在族长位置上不仅做得风生水起,而且总在关键时刻为宗族的秩序和利益显出中流砥柱的力量。他推行《乡约》、整修祠堂、组织“交农事件”、废黜儿子的族长继承权、不认女儿、平静应对农运带来的一系列动荡、带领族人抵御干旱、坚持不替田小娥修庙而是造塔等等,不仅显示出了独特的担当和勇气,而且为之付出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他的责任心和执行力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这里面既体现了传统文化所陶冶的个人魅力,也是他作为宗族社会的代表为维护这种社会秩序所特别为之的举动。白嘉轩作为族长,不同于宗族之内的任何一个别的个体,他所努力的一切其实与他个人有着更直接的联系,而维护宗法社会的既有秩序,他所得的回报显然也高于其他任何人,这实际上也正是封建文化的一个内在的秘密。鹿子霖之所以要另起炉灶,游离于宗法秩序之外,原因正在这里。

鹿子霖也是族里的能人，他家和白家在白鹿原一样，都有不小的影响力。起先他和白嘉轩联手在族里做了不少事情，但他很快发现这一切增加的都是白嘉轩的荣光，而与他并不相干，这是因为他并不具有像白嘉轩一样成为族长的特权。鹿家的家风教导后人要想方设法出人头地，其实正是骨子里对族长世袭既无奈又不满的体现。民国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动正好给鹿子霖提供了机会，他出任了白鹿村的“乡约”，于是这个“乡约”跟白嘉轩的《乡约》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白嘉轩以《乡约》文本为武器，鹿子霖以“乡约”官职为背景；白嘉轩以祠堂为阵地，鹿子霖则以保障所为阵地。二人明争暗斗、彼此较量，以此形成小说中一条基本的故事线索。由于鹿子霖的个人私欲极其膨胀，糟糕的人设使读者只将他与人品低劣相联系，因而不免忽略了他出任“乡约”的更深层和更复杂的原因。要真正了解白嘉轩，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鹿子霖，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品德的对比问题，而是涉及传统社会体制和秩序下人的选择和命运的深层次的问题。他其实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脱轨者，但又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新的思想因素，只是为了要实现出人头地的目的，才借现代社会的时势之力去获取机会。

与朱先生、白嘉轩、鹿三等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鹿子霖这样的脱轨者有所不同，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和田小娥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倾向。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是被寄予厚望的族长继承人，为此他始终按照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模式而活着，甚至没有想过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活着，可以说，他的所有言行都严格遵循着成为一个未来的族长的方向。但这一切的表面性和脆弱性被深谙人心又急于报复白嘉轩的鹿子霖给捅破了，他唆使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也从此彻底改变了后者的人生轨迹。此后的白孝文走着一条自私、投机和虚伪的道路，将人性之恶展示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具有灵魂深度的人物的精神演变。

白灵一落生就让人疼爱，她的聪明和灵气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然而她最大的不同寻常却是从小就不愿按部就班地照着大人的吩咐行事。进城念书

以后,她更是很快受到新的社会思想的召唤,并且对旧的宗法传统显示出对立和反抗。她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选择志同道合的鹿兆鹏为自己的伴侣,充满激情地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最终死于自己队伍里的错误整肃。其悲剧的结局让人叹息,同时更让人思索和难忘。

黑娃是宗法文化的反抗者,这种反抗的动力来自孤傲和倔强的性格。尽管他起初并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对宗法秩序构成了反抗,他只是凭着本能照着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娶田小娥、参加农运砸祠堂、沦为土匪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给人留下桀骜不驯的深刻印象。他闯荡半生后又拜在朱先生的门下,继之回归祠堂,终于还是在传统文化里找到慰藉,也给了白嘉轩莫大的鼓舞。

提到黑娃,就会让人想到田小娥。这是一个让人又有同情又有不屑的人物。她有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反抗命运的一面,但同时又缺少应有的自尊和自爱。如果说她爱上黑娃还多少让人同情,被鹿子霖侵占也是迫不得已,但她勾引白孝文并进而导致后者名誉扫地且败光家产则绝非出于自身处境之必要,虽说有鹿子霖谋划于前,白孝文自己堕落于后,但田小娥的行为仍然为人不齿,她被公公鹿三杀害后,引来瘟疫以表冤屈多少也使其分量打了折扣。这个人物其实体现了作者的某种矛盾心理,反映了传统文化、婚姻自由、女性权利等观念在作者内心的相互碰撞。

小说里的鹿兆鹏是一个很成熟的革命者,只可惜作者对这种成熟的经过并没有做出充分的交代。他对传统的宗法文化抱有彻底决裂和否定的态度,而且体现得十分自觉和坚定,这一点与黑娃出自本能的反抗形成对照。正如前面已经提到,鹿兆鹏和白灵投身于新的社会制度和理想的追求,旧的宗法社会伦理和秩序自是处在被否定之列,而并不主要表现为直接的反抗,所以他们跟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之间倒不像黑娃那样冲突,我们所看到的鹿子霖与鹿兆鹏、白嘉轩与白灵之间的对立主要是作为父子(女)之间的。

从上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看,他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宗法制度分崩离析而新的制度尚在追求之中的时代,守旧、趋新,脱轨的堕落、本能的反

抗,各自本于自身的文化心理而在白鹿原上演绎着他们的人生。守旧者自有一份悲情的担当,趋新者不乏神圣的豪迈,脱轨者映现出生存的茫然,而反抗者也放射出真实的人性之光。故事虽然发生在过去,却让人仿佛觉得又正在当下,其中贯穿的人性的压抑与摆脱压抑的渴望以极其复杂的纠结呈现在读者面前,它真正触及了我们民族灵魂的某些内涵,这是《白鹿原》摆脱单一的政治视角而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人、发现人得到的结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也改变了以往那种“先入为主”的定式,采取了较为客观的真相还原,重新挖掘了以往有意无意忽略和隐藏在表层之下的生活内容,从而使文本显现出难得的厚重,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审美体验,更加凸显了它独特的思想魅力。

二

作为一个坚持了多年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现实主义的基本方法仍然体现在陈忠实《白鹿原》的写作当中,同时他还借鉴和运用了国外魔幻现实主义等新的手法以及源于民间的某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学表现手段。作者始终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为创作追求,力求写出带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艺术世界。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不同于以往“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手段来刻画人物,使得以往农村题材或家族题材小说中出现过的诸多乡土文学人物在《白鹿原》中能别开生面,显示出性格的丰厚和心理的深刻,具有耐得住读者细心品味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作为传统文化“人格神”的朱先生的所作所为,还是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明争暗斗,还是白嘉轩与宗族内下一代的恩恩怨怨,或是下一代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和白灵等的人生起伏和坎坷,都是在一种新旧文化转换替代的大背景下予以展开的,都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形成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影响相联系,而最终他们的不同结局也为读者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博弈与文化的变迁以及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必然会对曾经面

对过的诸多严峻问题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所选取的几个富有特色的意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表达作品的思想内涵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成为整个小说中让人难忘的亮点,其中的白鹿、鳌子尤为突出。

小说取名《白鹿原》,“白鹿”意象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它代表着作者心中的理想和期盼,它的洁白和温顺象征着生活的和谐与美好,人人都渴望沾得它的瑞气;同时它又似乎是人的命运的某种寓示,充满某种神秘和玄幻,与实际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一意象的存在,为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活动提供了一层充满想象的色彩和对应,使文本的内涵空间更具艺术的张力。小说中与之天然相近的两个人物分别是朱先生和白灵,而通过人为努力得到白鹿祥瑞的是白嘉轩,其中所寄寓的作者的意念值得玩味。

“鳌子”是朱先生用来比喻原上田福贤、鹿子霖与黑娃的农会之间的斗来斗去的词语。朱先生不懂得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但他忧患于民族内部的苦难,渴望以“仁义”凝聚民心,这虽然与当时时代潮流不免背离,但毕竟流露的是一个期盼“为万世开太平”的智者的心声。白嘉轩正是基于这一态度,确立了他在时代演变中的文化立场。如何评价这一比喻和态度是一回事,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小说中的提示意义是另一回事。

另外小说中白灵和鹿兆海通过掷铜圆的方法来决定各自加入国与共的哪个党派,表面上看似乎将政治选择视同儿戏,但考虑到行为发生时的具体历史情境和两个当事人的思想实际,这种描写并不草率,反而为之后随着思想上的不断成熟而做出的选择做足了铺垫。这种前所未见的写法其实收到了更好的效果,体现了作者敢于创新的精神自信。

小说结构谨严,故事绵密。作者在叙述上多处采用倒叙、补叙等手法,以保持整体叙述的流畅和紧凑。小说结尾,白嘉轩面对成为县长的儿子和已失去理智的鹿子霖,脑中想到的是小说开头他处心积虑地与鹿子霖换来“风水宝地”的情节,既有得意,又有忏悔之意,似乎给人的感觉既是想让一切回到开始,又认可所有的现实即为合理。小说似从终点回到了原点,又仿

佛是一切都只能是另外的开始。这个结尾不仅起到了对开篇的呼应,也指向了更开放的意义空间,十分耐人寻味。

三

前面已经提到,《白鹿原》问世以后,虽然受到读者的持续好评,但同样也引起过不少的争议。对一些具体的争议,我们大可以本着见仁见智的态度由评论者们慢慢去讨论。但也有人认为《白鹿原》基本没有什么独特的艺术价值,或者从各种角度竭力贬低小说的艺术成就。某位论者就断言“《白鹿原》绝不是作者天才运作精心独创的文学经典,而是一部杜撰历史与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其内容的荒谬性与形式的模仿性,既反映了作者本人艺术想象的幼稚,也反映了当代文坛麻木不仁的无知”^[4]。这不仅是指陈忠实的创作无能,还附带连累了整个当代文坛。但只要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白鹿原》小说的人断不会被这种“惊人”之语唬住,因为它既不符合小说的实际,也无法说明长期以来读者对它的喜爱。

笔者的老师丁帆先生在《白鹿原》出版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这部小说评价不高,特别是对作者所“期许”的“史诗”追求不以为然,不久之前却主动撰文谈到自己的“失察”。他写道:“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尤其是像我当年这样草率判断的评论者)都忽略了一部完全可以彪炳史册的巨著《白鹿原》,或者说是低估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轻忽当然就是对优秀作品的亵渎,同时也是造成失重的滥觞。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一定是要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立专章来评析的,因为它的分量远远超越了当代许许多多的作家作品,成为二十世纪末长篇小说的一座里程碑。”^[5]他对自己没有能够让陈忠实在生前看到他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感到遗憾,这一方面体现了丁帆先生作为一名学者的真诚和勇气,另一方面体现了《白鹿原》经历时间检验之后的价值。

总之,一直喜欢《白鹿原》和像丁帆先生这样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

意识到《白鹿原》的价值的读者和评论家,都将继续不断地去认识和发掘小说的艺术成就,这不仅是对这部作品负责,更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负责。

笔者自《白鹿原》问世以后,一直是小说的忠实读者,类似有人酷爱《红楼梦》而被称为“红迷”,笔者因为爱读、爱谈论、爱跟学生们讨论,也曾写过评论的文章而被人称为“白迷”。从开始读《白鹿原》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每读一次,笔者都有新的感受和发现。把这些感受积累起来,就形成了眼下的这部书稿。它不同于其他从单一的角度解读和评论《白鹿原》的书稿。笔者觉得在小说问世以来,能被发现的单一角度几乎都已被评论家们做过,当然以后或许还有更新的角度被人们发现和挖掘出来,但目前似乎任一单独的角度都不足以再对这部小说做出全新而充分的阐述,况且那种从某一角度切入的方法也难免常常会出现牵强和夸张的偏见,在突出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同时会掩盖甚至歪曲小说本身丰富的多样性意义和启示。笔者虽然仍然期待有论者能够做出那种从某一角度入手、见解独特而深刻的论述,但同时更希望能够不拘一格地保留对小说阅读产生的更大量、更原生态的体验和感受,其中自然也蕴藏着进一步单独论述的元素和生长点。基于此种原因,笔者将逐章阅读小说的体会和感受,以“论札”的形式,不拘长短、不论体式、不分题旨大小,在某些地方也不分内容前后,随感而发。本书稿的部分内容也引用了笔者之前论述《白鹿原》的文章观点。文中凡引用和评述他人谈论小说的见解和观点,均在每章之后一一注明,其中有赞同,有保留,也有商榷,读者自可明察。

注释:

[1] 雷达:《废墟上的精灵——〈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2] 房伟:《传统的发明与现代性焦虑——重读〈白鹿原〉》,《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3] 袁红涛:《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文学评论》,2009

年第6期。

[4] 宋剑华:《〈白鹿原〉:一部值得重新论证的文学“经典”》,《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5] 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当代文学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第一章

本章故事梗概：白嘉轩前六房女人结婚之后都很快死去，父亲在他第三房女人死后突然暴病死去，留下的遗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母亲一再坚持“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白嘉轩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灰心，冷先生劝他去找找阴阳先生。

●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小说第一句话是有点噱头的，有评论家已经指出这是模仿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也许有读者会以为这部作品有很多这样的模仿，其实并不如此。事实上，这句话本身也不太属实，白嘉轩自己后来引以为豪的事情似乎也不是娶了七房女人。如果真是这样，白嘉轩也不会成为后来的白嘉轩了。但也许这句话太有吸引力了，也太适合做一篇小说的开头了，因此作者便索性布了这个烟雾，用了一个时髦的开头。评论家蔡葵就说这第一句话就把他吸引住了。^[1]有同样感受的读者肯定也不少。雷达先生认为这个开头“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化性”^[2]。生殖崇拜和雄性能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话题，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语境里，这两者相比之前小说常见的话题都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和大众性，以此吸引读者的关注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文学风尚的痕迹。雷达所说的“疏离社会性”和“强化文化性”的角度对理解全书也有一种总体提示的意义。

“娶了七房女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当是与男主人的“性”有关，这确实不错。事实上却不止于“性”，“性”后面的繁殖、传宗和延续才是真正的落脚